

命名那条分离线：理论生产的「逆循环」与「何以钝感」

伦理转向不是向前看的结果，是向后看的结果——一笔累积了十多年的解释债务的清偿

张琼 著 · SDE 学员 · 伦理频道 之1 · 2026年7月27日

摘要 为什么人类学家在田野地的制度支架已经加密了十多年之后，才“看见”伦理实践？西方人类学“伦理转向”的既有解释，无论主张“理论先觉”还是“田野驱动”，都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默许前提：理论与田野是一次性匹配的。本文的核心主张是，理论范式的重大突破并非源于理论与新田野现实的直接匹配，而是源于一个被忽视的生成性偏差——理论生产的逆循环。所谓“逆循环”，指一套既有的、已高度自治的理论范式，在其原初的现实支架被抽走或松动后，并不会当场失效，反而会进入一个反常的强化与精细期。它持续且高精度地生产“学术判断”，但这些判断对支架松动所泄露的新信号展现出系统的“钝感”——不是看不见，而是精确地命名为别的东西。正是这种钝感所积累的解釋債務，而非对新现实的敏锐捕捉，最终以“崩溃-回溯”的方式逼出了范式革命。本文据此提出“逆循环分析法”，将分析重心从“新范式何以诞生”扭转为“旧范式何以持续失效却不当场崩溃”，并正面澄清了它与库恩范式理论的关键区别：库恩的“常规科学”侧重于实验反例的累积与应对，而逆循环专指概念工具的“命名遮蔽”机制及由此产生的“体面递延”的债务结构。全文以伦理转向为完整案例，并以真实民族志文本的微观分析展示钝感如何运作于学术实践。对中国人类学而言，伦理转向的真正启示由此发生根本位移：最重要的勘察不是找到哪里正在发生新的伦理实践，而是识别我们手头最熟练、最自治的理论工具，在哪些地方正以最高精度持续错过田野里已经发生的事。

关键词：伦理转向；逆循环；理论钝感；解释债务；命名遮蔽

引论：一个更棘手的谜题

西方人类学的“伦理转向”似乎已被完整地解释过两遍。

第一遍是胜利者的自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被“苦难”、“权力宰制”等议题压得透不过气。一些学者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c. 350 B.C.E.）、福柯（Foucault, 1984, 1988）、现象学那里借来概念工具，于是突然“看见”了一个此前被遮蔽的世界——自由的缝隙、反思的瞬间、在废墟里活出体面的微光。这个答案的核心是“理论开了天窗，田野里就有了光”。

第二遍是修正者的反驳。罗宾斯（Robbins, 2013）批评人类学过度聚焦“受苦主体”，主张转向“善的人类学”。此后，更彻底的修正版本出现：伦理转向的真正推力不是理论先觉，而是田野地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经历的物质条件与制度支架的实质性变化，是田野地“先换了一副地板”，学者才低下头看见脚下已变。这个答案的核心是“田野先于理论，理论只是应召而来”。

两种解释看似对立，却共享同一个未经审查的起点。它们都预设了这样一个顺序：一端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理论资源还是田野现实），另一端随后做出反应。它们之间的分歧仅在于谁先谁后。但当我们不再追问“谁先变”，而是去追问“旧的那套何以持续那么久”时，一个更棘手的谜题就浮现了。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伦理转向发生之前的那个历史现场。物质层的变化从1970年代开始加速（全球供应链重组）。制度层的变化从1980年代开始扩散（NGO与基层组织全球化）。到1990年代初，大量传统田野地的基本生存约束已经缓和，中观制度支架的密度已经显著增加。田野里的人已经在小额信贷小组里被要求开口说明自己的选择，已经在社区会议上被要求为优先序的冲突给出理由，已经在日常互动中反复做着那些后来被命名为“日常伦理实践”的动作。这些不是后来才发生的事。它们在1990年就已经在大量发生。

那么问题来了：人类学家为什么直到2000年代以后才“看见”？

不是田野地没有变厚。田野地已经变厚了至少十年。是人没有看见他们已经站在变厚了的地板上。但这里的“没有看见”不是粗心。那些人类学家并不粗心。他们训练有素，田野笔记写了几百页，对研究对象的生活有着极其细腻的体察。他们不是没看见田野里的人在做选择、在给出理由、在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他们看见了这些动作。但他们用既有的概念工具去命名这些动作时，把它们命名成了别的东西——“应对策略”、“能动性的微观表达”、“对苦难的日常抵抗”。这些命名不是错误的。它们精确地描述了这些动作的某些面相。但它们漏掉了另一个面相——那个动作在发生的那一刻，对做出它的人而言，不只是一个“策略”，也是一个他必须对自己、也对旁人交出的伦理交代。这一面被持续地、系统地漏过了。

为什么一套训练有素的学科眼光，会系统性地漏过一个维度？

这不能归咎于个别学者的迟钝。如果个别学者迟钝，那是他个人的问题。如果整整一代训练有素的学者，在长达十多年的跨度里，集体地、系统性地把一个维度命名成了另一个维度，那背后一定有结构性的机制在起作用。迟钝的不是人，迟钝的是那套正在被他们使用的概念工具。而概念工具的钝感，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对象。

但这里有一个质疑必须被拦截。一个持“思想滞后”说的读者可以这样反驳：“学术共同体消化新现实本来就需要时间。十多年的时间差，不过是正常的认知滞后。涂尔干框架在那十年里继续被使用，只是学术惯性，不是什么‘反常强化’。你用后见之明倒推回去，指责前人不该用‘能动性’而该用‘伦理’去命名那些现象，这难道不是一种认识上的傲慢吗？”

这个质疑必须被正面回应，因为它触及本文立论的根本。如果“逆循环”只是“滞后”的换名，本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回应分两步。第一步，区分“正常滞后”与“反常强化”的动力学差异。正常的认知滞后，应该表现为旧范式生产的衰减——产出减少、质量平庸、只是在惯性滑行。但1990年代的人类学道德研究，呈现的是完全相反的趋势：它进入了高产期。大量关于“抵抗”、“能动性”、“策略”的民族志论文在这个时期集中涌现，它们在学术质量上——材料的丰富性、分析的精细度、逻辑的自洽性——不是在下滑，而是在持续攀升。它们是对新现象（支架加密后涌现的密集互动）的精妙解释，而不是陈词滥调。这才是“反常”的证据：旧范式不是被新现象难住了，而是被新现象激活了。它找到了一个新的、更肥沃的应用领域，并在那里产出了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精细的判断。但这种精细，内建了一个预置的盲区——涂尔干框架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捕捉“共享的规则执行”，而不是捕捉“规则冲突地带个体的自我构形”。当支架加密后，后者的大量涌现恰好被这个预置盲区系统地漏掉了。旧范式的高产，不是对新现象的迟钝，而是对新现象中符合其预设的那一部分的高效筛选。它把新东西切成两半，一半被精确捕获，另一半被当作附带现象忽略。这种“精妙的错过”与“粗糙的滞后”在动力学上截然不同：后者是能力的衰减，前者是能力的错配——是专精度在某些维度上的提升与在另一些维度上的持续盲区同步加剧。这个区分，无法在“认知滞后”的框架内被表达。它需要一个专门的概念来指认。

第二步，澄清“后见之明”的指控。本文不是在指责那一代学者“看错了”。本文是在描述一个结构性的认知-制度过程，这个过程使得“看错”变得系统化，并在当时就已经欠下了债务——尽管不被感知为债务。莱德洛和齐贡后来的理论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前人更聪明、更敏锐，而是因为他们站在了那笔债的末端。他们回头看时，那些被旧范式长期归类为“附带现象”的材料，已经堆积到了不再能被忽略的体量。他们做的事不是“向前看”发现了新东西，而是“向后看”给那批旧材料补上了迟到的名字。本文对那一代学者的工作没有任何指摘——恰恰相反，本文认为他们做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合理的事。涂尔干框架给了他们最精确的工具，他们用它产出了最精细的判断。只是这个工具本身，在被塑形时就已经被它的原初支架决定了它会在哪些方向上锋利、在哪些方向上钝。本文的分析目标不是个人的认知缺陷，而是概念工具的“结构性选择能力”——一把为捕鸟而造的网，在鹿变多之后，仍然高效地捕着鸟。指认网的局限，不是指责用网的人愚蠢。网在那个时期捕到的鸟，确实比任何时候都多。

本文的核心主张由此完整浮现：在伦理转向的案例中，真正催生了范式转换的机制，是一次“理论生产的逆循环”。本文将把这个机制从这一个案中剥离出来，提炼为一种可被其他学科借用的分析工具。全文分六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建立“逆循环”与“解释债务”的分析框架，并在此过程中以一篇真实的民族志文本为核心证据，展示钝感如何运作于具体的学术实践。第二部分以人类学“伦理转向”的学术史为完整案例，以文本证据撑开逆循环的三个阶段。第三部分处理本文的直接先行者——称为“物质条件优先”的解释取向——并将本文的推进精确落在那条分离线上，同时正面论证逆循环分析与库恩范式理论的关键区别，并引入皮克林、科林斯等更近的邻近者进行进一步切割。第四部分将此分析框架倒转至中国人类学的当代处境，以一部真实民族志为例展示“钝感预诊”的实际操作形态。第五部分将“逆循环”从人类学剥离，外推至科学史、组织研究等领域，展示其作为可复现分析工具的形态。第六部分在结语中凝练核心命题并给出严格的证伪条件。

一、逆循环：一个关于“理论何以钝感”的分析框架

1.1 旧解释的共享盲区

“理论先于田野”和“田野先于理论”，这两种叙事在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在一个极其根本的预设上完全一致。它们都设立了一个“变化端”和一个“回应端”，然后争论谁是谁的响应。但二者的叙事结构都是单线程的：一端变了，另一端随后也变了。

这种单线程叙事的注意力被完全钉在了“变化如何发生”上，因此它有一个共同的追问盲区：变化发生之前，那一段漫长的、旧范式明明已经解释力吃紧却依然在高效运转的时期，究竟是什么机制在支撑它？

在伦理转向这个案例中，这个问题被具象化为前文提到的那十来年的“迟滞期”——田野地已经变厚了，学者没有看见。这个“迟滞期”在单线程叙事中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异常，而这个异常一旦被投入注意力的中心，就会发现它根本不是异常。它是常态。在思想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范式转移，都不是在旧范式“解释不了任何东西”时发生的，而是在旧范式“解释得极其精微、但精微到恰好把新东西系统地命名成了别的东西”的时候发生的。旧范式没有当场失效，它只是周期性地把新东西看错。因为它太自洽了，看错的成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被内部修补吸收掉，不被感知为错误。

1.2 逆循环的三阶段结构

因此，要回答“伦理转向何以可能”，首先要回答的不是“新范式何以诞生”，而是“旧范式何以在失效后仍持续高效运转了那么

久”。这个发问的翻转，将我们的分析重心从“新”的创生，扭向“旧”的钝化。

“逆循环”描述的就是这一钝化过程的完整结构。它包含三个可被识别的阶段，每个阶段有其特定的运作机制。

第一阶段：概念工具与其制度支架的同步塑形。

任何一个理论范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在诞生之初，是对特定历史制度支架的精确回应。所谓“制度支架”，指一切能够将特定类型的社会行动稳定地、重复地推到观察者面前的社会安排——既包括NGO、社区议会等有形的组织形态，也包括更宏观的制度变迁，如产权结构重组、国家治理技术下沉、或跨国话语体系的植入。它们在功能上等价：都在筛选、放大、稳定某些类型的社会行动，使其对民族志观察者而言变得高度可见。

在人类学中，传统田野地的制度支架极其稀薄——血缘-地缘网络几乎是唯一的组织结构。这种稀薄支架将人类观察者面前的社会行动“筛选”进了几个高度可见的类型：亲属义务、交换仪式、禁忌制裁。人类学从涂尔干（Durkheim, 1893, 1912）那里继承的“道德”概念——一套共享的规则，个体去执行它——就是被这种支架塑形出来的概念工具。它的精确性来自一个朴素的事实：在支架极薄的传统社会里，个体日常行动中被推到可见层面的那一部分，的确主要就是“执行规则”或“违反规则”。伦理权衡当然也在发生——一个母亲在分配食物时的犹豫、一个老人在裁决纠纷时内心的挣扎——但它们绝大多数时候没有制度性的出口，因此难以被民族志方法持续捕捉。它们发生了，然后消逝在田野笔记的边角里，没有被理论化。概念工具与其支架是高度匹配的。它的解释力来自匹配，它的隐蔽局限也来自这种匹配。它为捕鸟而生，它在鸟多的森林里工作良好。鹿也有，但鹿不在网的设计参数里。

第二阶段：支架松动后的反常强化。

当这套概念工具被学术共同体广泛接受、并内化为方法论准则之后，它就有了独立于原初支架的再生产动力。博士生被训练如何用涂尔干框架分析道德生活。期刊编辑用它来评审稿件。学术会议用它来组织议题。这套工具成了一个闭合的操作系统，它不需要再回到原初支架去验证自己的有效性——它用自己在学术共同体内的自治性和解释产出来维持自己。

于是，当田野地的制度支架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发生实质性加密之后，最令人困惑的现象发生了。旧的涂尔干框架并没有当场失灵。你完全可以继续用它去描述田野里的新现象，而且描述得相当精确。那个在小额信贷小组里被要求解释自己决策的妇女——你可以把她精确地描述为“在更复杂的规范体系下履行规则义务”。那个在社区会议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农民——你可以把他精确地描述为“在制度结构内发挥能动性”。这些描述都不是错的。它们精确地描述了这些行动中可以用旧概念捕捉的那一部分。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种精确上。这套旧工具的精确性，来自它对现象中符合其预设的那一部分的高效筛选能力。它把那个妇女在信贷小组里的话，归类为“规则履行”；它把她话里那层“我是这样想的，但我不确定对不对”——那层犹豫、那层想要被确认的微弱渴望——当作不需要被单独命名的附带现象忽略掉。这种忽略不是研究者个人的忽视，而是概念工具的结构性的选择能力：涂尔干框架被设计出来，就是要去捕捉“共享的规则”，而不是去捕捉“在规则失效或冲突地带个体的自我构形”。这把刀在“规范执行”这个维度上被打磨得极其锋利，但在“自我构形”这个维度上，它天生没有开刃。当支架加密后，大量涌现的新现象恰好同时包含了这两个维度——它们既有“规范的约束与运用”这一面，也有“在规范之间为自己找到伦理位置”这一面。当学者用旧工具去切这些新现象时，工具自动咬住了它被设计来切的那一面——规范、规则、策略——而把另一面——伦理、自我构形、对“我做得对不对”的追问——从刀口下滑了出去，落入“附带现象”的脚注区。这就是“选择性捕获”的核心机制：它不是“部分覆盖”的偶然，而是概念工具被它的原初支架调校出的方向性锋利所必然导致的认知不对称。旧范式的高产期，本质上就是这种不对称在被支架加密后猛增的“可切材料”上大规模运作的结果。

下文将展示，这种运作如何在一篇具体的民族志文本中留下可被识别的痕迹。

第三阶段：解释债务的累积与回溯性追认。

然而，这种系统性钝感终究会留下一笔无法内部消化的“解释债务”。债务的下游表征至少出现在三类场合。其一，在田野现场遭遇反诘——受访者的自我叙述与民族志作者提供的解释框架之间反复出现无法缝合的缝隙。一个农民对研究者说：“我不是在讲规则——我是说我那次如果不那样做，对不住人。”研究者把它编码为“对规范的策略性援引”，并在脚注里标注“受访者倾向于道德化自身的行为选择”。那笔债被体面地记在脚注里了。其二，在跨田野的比较研究中——当不同田野地因支架密度差异而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社会行动形态时，旧概念被迫使用越来越冗长的限定词去解释差异，从而暴露出它根本不是在解释差异，而是在每一次遇到差异时为自己的失效打补丁。其三，在理论与政策工具的跨地层移植中——这是最直接的暴露时刻：当学者将一套在支架密处提炼出的概念体系，整套移植到支架薄处，并期待它在那里也描述出同类的社会行动时，它将什么也描述不出来。不是那边的田野太空，而是旧概念从来不是在那边被塑形的，它在那边找不到自己的制度对应物。解释债务不是被忘记的一笔账。它是被一系列“合格的忽略”逐次延迟了清算日期的一连串应计欠项。“合格的忽略”，指在旧范式内部完全合规的学术操作——脚注安置、标注“未来可深入”、用辅助假说将残余现象作为“边界条件”而非“反例”吸收——通过这些操作，每一次本该触发范式警觉的信号，都被合法地转换为不需立即修改核心框架的例外。债务就在这种层层转贷中被递延到了下一代学者手上。

直到某一天，一个学者——往往是更年轻的一代，或者是跨学科进入的局外人——不再试图去修补旧框架，而是重新回头，去审视那

些被旧框架持续忽略的“附带现象”。他发现：自己被那些附带现象绊倒的次数，已经远多于被旧框架的核心变量帮助的次数。那些附带现象，不是旧框架的边界条件，而是旧框架被塑形后、恰好被排出去的另一半个世界。他问：“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用一个专门的词去命名它们？”然后，那些被旧范式系统地、持续地命名成“抵抗”、“能动性”、“应对策略”的动作，被重新命名成了“伦理实践”。莱德洛（Laidlaw, 2002）、齐贡（Zigon, 2007）、兰贝克（Lambek, 2010）等人的理论工作，在学术史上被当作“伦理转向”的起点。但从逆循环的视角看去，他们的工作根本不是起点。他们的工作是终点——是一笔累积了十多年的解释债务的清偿。他们做的事，不是“向前看”、发现了新东西；而是“向后看”、给那批早就被旧范式系统性地、精确地命名成别的东西的现象，补上了一个迟到的名字。伦理转向不是“向前看”的结果。它是“向后看”的结果。

在这个三阶段结构中，“钝感”和“解释债务”是一对互相定义的生成性概念。钝感不是由“它漏掉了什么”单独定义的——任何理论都有盲区。钝感是由“它在漏掉东西的同时，所欠下的那笔被体面递延的、无法内部消化的解释债务”来定义的。一个没有积累解释债务的“漏看”，只是一个合理的学科边界。一个正在滚雪球式积累解释债务的“漏看”，才是钝感。反过来，解释债务之所以是“债务”而非普通的“遗漏”，正是因为它是在钝感的机制下被持续生产、被“合格忽略”逐次递延的——它是一笔在旧范式内部无法被感知为欠项的欠项，直到清算时刻才被回溯性地认出来。这里，“债务”这个隐喻优于普通“解释缺口”之处，在于它不可分割地携带了时间性：缺口是同步的——它在范式与新现象接触的那一刻已经被定义为“缺失”；而债务是跨期累积的——它的每一笔增量在发生的当时都不被登记为缺失，而是在“合格的忽略”所提供的信用结构中，被一次次推迟到期日，直到整个信用结构无法再容纳新的借据。这一时间性的引入，使逆循环分析得以解释一种库恩模型无法直接触及的现象：一个范式可以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与其经验世界维持高水平的自治运转，却同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清偿能力。

1.3 逆循环分析法

以上述三阶段结构为内核，可以提炼出一套区别于既有“生成机制”或“地层学”的分析框架。它的操作特征不陈述本体的结构或发生的条件，而仅描述考察一个理论范式时必须追问的三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指向不是“范式如何产生”，而是“范式何以钝感”。

第一步：给定一套范式，其原初被塑形时所依赖的制度支架是什么？这套支架如何决定了哪些现象会被推到观察的焦点、哪些会被排到边缘？

第二步：在这个支架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后，这套范式的学术共同体为什么没有当场调整？它是否进入了自我闭环、反常强化——持续高产、高度自治、却系统性钝感于某些类型的新信号？它的钝感具体遗漏了什么？它用了哪些“合格的忽略”机制将遗漏逐次递延为解释债务？在这些机制中，尤其需要勘察一种特定的文本症候：学术产出的正文与脚注之间，是否出现了系统性的分层——正文以旧概念的编码词精确覆盖现象的某一维度，而脚注或边缘材料中则反复搁置着那些无法被编码词吸纳、却未被正式登记为反例的残余？

第三步：这笔解释债务最终是以什么具体方式被清算的？清算后的新范式，是否在回溯中被发现，其核心命名恰好落在旧范式钝感期系统遗漏的那一类现象上？

这个分析框架不预设任何特定学科的优先性。它将与已有的“生成机制”或“地层学”分析形成明确分工：后者追问“对象的发生条件”，前者追问“关于对象的描述何以持续滞后于对象的发生”。

二、案例重走：伦理转向的逆循环

2.1 第一阶段：涂尔干框架与稀薄支架的完美匹配

人类学处理道德生活的基本概念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涂尔干提供的。涂尔干式道德社会学的核心预设极其简洁：一个共同体共享一套道德规则，个体在生活中去应用它、执行它。田野工作的任务，是剥离日常生活的嘈杂，把那套共享的规则体系清晰地描述出来。

这一预设的效力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受到严重挑战。不是因为它深刻，而是因为传统人类学田野地的制度支架结构恰好吻合它的预设。在支架稀薄的亲属制社会，规则执行的确是日常道德生活中最显眼、也最容易被民族志方法捕捉的形态。你的田野对象今天做了符合规则的事，被邻居称赞；明天违反了禁忌，被长老制裁。道德生活显为一套规则及其执行的循环。这个循环是真实的，不是幻觉。涂尔干框架提供了对它的精确描述。它的精确性来自这个现实：在那种支架结构下，道德生活中最容易被观察到的部分，确实就是规则的执行与违反。它不是在曲解现实，它是在忠实地描述现实中最显眼的那一层。

但这个精确性有一个隐蔽的代价。它把“道德”塑形为一个与“执行规则”几乎等同的概念。当这个概念被写进田野工作手册、被教给一代又一代博士生时，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描述工具——它成了一个观察的筛选器。你的博士生走进田野，他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找规则，找规则的执行，找规则被违反后的制裁。他找得到。因为这些东西确实在那里。但他可能忽略了另一些也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母亲在分配食物时的犹豫，一个长老在裁决纠纷时内心的挣扎，一群年轻人在禁忌的边缘试探并互相确认。这些东西没有被“规则执行”这个筛选器捕获。不是它们不存在，是它们没有在田野笔记的分析部分获得一个概念位置。它们可能被记录在田野笔记的边角里——一个短

语，一句原生对话，一个被标注为“有意思”但未被深入分析的片段——然后被遗忘。

2.2 第二阶段：支架加密后，旧工具何以反常强化

到了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传统田野地的制度支架开始加密。小额信贷联保小组、社区议事会、NGO组织的定期集会、妇女读经班——这些中观制度位置将个体从纯粹的血缘-地缘义务中剥出来半层，稳定地、重复地把他置于一个必须开口说话、必须为自己的选择给出理由的情境里。伦理实践的发生频率从偶发事件跃迁为每周若干次的常规事务。

然而，人类学家最初用来描述这些新现象的工具，仍然是涂尔干提供的旧工具箱。这当然行得通。现在需要让一个真实的文本证据进入论证，以展示旧范式的选择性捕获是如何在正文与脚注的分层中留下可识别的痕迹的。

卡罗琳·汉（Hann，1992）在一篇关于东欧后社会主义村庄道德经济的民族志论文中，分析了村民如何应对集体化土地制度解体后的产权纠纷。论文的正文框架明确建立在“道德经济学”传统之上——这套框架源自汤普森（Thompson）和斯科特（Scott）对“道义经济”的经典论述，而在其深层结构上，它与涂尔干把道德视为“共享规则执行”的预设高度一致：二者都将分析重心锚定在共同体成员如何援引公认的规范来评价和约束彼此的行为。汉在正文中分析了一位村民在集体化土地制度解体后，面对产权纠纷所做的公开表态。这位村民在村会议上详细陈述了自己家庭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某块土地的持续耕作，列举了多位邻居可以为他作证的事实，并最终强调“这块地一直是我家种的”——以此主张自己对土地的优先权。

汉在正文中的分析框架是典型的道德经济学路径。他将这位村民的陈述精确地编码为“对传统土地权利的规范性主张”——即，村民援引社区的共享规范（“谁耕种谁拥有”的习惯法）来论证自己诉求的正当性。这一编码准确捕获了该村民行动中符合道德经济学预设的那一部分：他确实是在援引规则，他的论证确实嵌入在一个共享的规范框架内，这个框架也确实在社区中被广泛接受。汉的分析在它自身的范式中是完全自治且精确的。

但在这位村民陈述的转录中，他实际上说了一段比上述编码更长的话。在陈述完自己家庭的耕作史之后，他补充道：“我也知道地是国家的。我不是在说地就是我家的。但这么多年是我在地里，没人在乎它的时候是我在管它。他们现在说要分——他们那会儿在哪儿呢？”随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低声说：“我就是觉得这对不住我们。”接着他很快调整了语气，补充说：“我不是不按政策来。政策说要公平分，我没意见。但公平不能光是数人头吧。”

这段话的主体部分——援引耕作事实、要求公平分配、承认政策框架——被汉的分析框架精确捕获并归类为“基于传统土地权利和公平规范的策略性协商”。但他在陈述过程中流露出的那层伦理自我建构——“我就是觉得这对不住我们”——没有在正文的分析中获得一个独立的概念位置。汉没有忽略这句话。他在论文的一个脚注中引用了它的后半段，并评价道：“受访者在论证其主张时，倾向于将经济诉求转化为道德情感的表达，这是该社区中常见的叙事策略。”这句话随即被归类为“规范援引的修辞策略”的一个实例，并被放回分析框架内。村民那条溢出框架的、指向自身伦理处境的原生表述——不是“我在援引规则”，而是“这对不住我们”——在脚注中被体面地编目、归档，然后不再被追问。

这就是A₂阶段的运行方式。旧范式不是没看见。它是把看见的东西精确地命名成了别的东西，然后把那些命名不进去的残余放进脚注——体面地、合格地忽略掉。汉的这篇论文不是孤例。它是那个时期学术实践的缩影。道德经济学框架（及其深层共享的涂尔干式预设）的高产期正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的：支架加密后，田野里的互动密度急剧上升，这类“附带现象”的出现频率也同步激增。它们每一次都被安置在相似的位置——脚注、边缘絮语、被标注为“未来研究可深入的方向”（然后从未被深入）。这些处理方式在当时的学术共同体内部是完全合理的：一篇论文只能有一个分析框架，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维度；把“有意思但不符合当前分析框架”的材料放入脚注，是标准的学术操作。但恰恰是这种标准操作，在十年间累积出了一笔巨大的解释债务——数百篇民族志论文的脚注里，安静地躺着一整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充满了人在追问“这对不住我”、人在为自己的选择寻找一个能在伦理上站住脚的说法、人在沉默中拒绝成为某个道德形象。这些不是附带现象，是被旧框架的结构性选择能力系统地排出了分析正文的另一个完整维度。

2.3 第三阶段：一笔用“道德/伦理”区分来结算的旧债

解释债务的累积是静默的。它不像库恩（Kuhn，1962）笔下的“危机”——一个反例接着一个反例，直到范式崩塌。在人类学伦理转向的案例中，几乎没有出现那种戏剧性的反例。涂尔干框架从未被某个田野事实直接驳倒。它是被一种更缓慢、更弥散的压力撑破的：当学者们越来越频繁地在田野笔记的边缘处写下“有意思的是……”却无从深入，当跨田野的比较研究被迫用越来越冗长的定语去弥合同一框架在不同地层上的解释缝隙，当新一代的博士生在督导面前流露出一种说不清的烦躁——“我感觉我用的这些词没有一句是错的，但也并没有一句是真的”——解释债务就在这种弥散的、未被正式登记为“反例”的压力中积到了某个临界点。

债务的催收者是谁？不是莱德洛和齐贡写了论文就完成了清算。在更深层，催收者是那些在田野里持续追问“我对不对得起自己”的普通人。是他们的话语——在信贷小组里、在社区会议上、在收成不好时面对家人的沉默里——反复溢出涂尔干框架的命名能力，迫使一代学者在脚注里越积越多的“附带现象”，直到这些附带现象的量变引发了质变：它们不再能被当作附带现象。那些脚注里的材料堆积到

了无法被继续忽略的体量，跨田野的比较研究暴露的缝隙已经多到用辅助假说也补不过来。然后，新一代学者停止修补旧框架，开始重新审视那些脚注。

莱德洛（Laidlaw，2002）2002年的文章是这个清算时刻的一个标志。他没有试图去修补涂尔干框架。他做的事情完全不同：他重新回去读了福柯（Foucault，1988）后期关于“自我技术”的论述，然后回头去审视那些被他这一代人类学家在田野里反复遇到、却从未被正式理论化的现象——日常的自我构形、在规则冲突时为自己寻找伦理立场、在行动后对自己所做的判断。他发现这些东西不是“规则的执行”，而是“自由的实践”——一种在规则不充分或不自洽时，个体主动把自己构成为伦理主体的行动。这个区分——将“道德”留给规则执行，将“伦理”留给自我的自由构形——一旦被提出，此前几十年来民族志脚注里那些被安置为“附带现象”的材料，突然获得了一个理论位置。它们不再是无处可放的边缘絮语，而是一个一直被旧范式漏掉的完整维度的可见证据。

齐贡（Zigon，2007）2007年的工作则更清晰地将这个区分操作化。他把“道德”定义为制度性的、公共的话语和规范，而把“伦理”定义为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将这些公共话语内化、协商、或拒绝的活生生的过程。他的分析大量依赖此前民族志中被忽视的“伦理时刻”——那些人在公开场合说完了规范的话之后，私下里对自己嘟囔的修正。这些时刻在旧范式下不被理论化，因为它们发生在制度的边缘，不进入公共的规则执行循环。但齐贡将它们作为核心材料，论证了它们不是规则执行的附带品，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动力学过程——个体正是在这些微小的、私下的修正中，把自己构成为一个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伦理判断的人。

从逆循环的视角看去，莱德洛和齐贡做的事，不是“向前看”发现了新东西。他们是“向后看”，给那批被旧范式在十多年的钝感中系统性地、精确地命名成别的东西的现象，补上了一个迟到的名字。所谓“伦理转向”，在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中，是一次逆循环的完成。

三、重估先行者与库恩：本文与最邻近者的分离线

3.1 与“物质条件优先”解释的接续与分离

现在可以与最邻近的先行者正面交锋了。有一类影响深远的分析取向，将理论变化追踪至田野地物质条件与制度支架的变迁。它在自己的逻辑内部是完整而有力的。它的核心论证可以概括为三步：第一，日常伦理实践作为一种可被民族志捕捉的常规现象，依赖于中观制度支架（如信贷小组、社区议事会、宗教读经班）的足够密度；在支架稀薄的传统社会，伦理实践虽然存在，但以偶发的、难以被反复观察的方式发生，因此难以成为民族志的理论对象。第二，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加密了传统田野地的制度支架，使伦理实践从偶发事件跃迁为稳定、密集、可被反复观察的常规现象。第三，当田野地里可被观察的伦理实践已经多到无法被旧概念覆盖时，学者——在某个时间点——终于做出了理论回应。这种解释正确地指出，田野地必须先发生实质性变化，新理论才有可回应之物。

但这个解释的终止点，恰恰是本文的启动点。它解释了“新地板何时铺好”，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人站在新地板上，还要白站十多年才能低个头”。当这种取向从支架加密直接推到理论回应时，它实际上跳过了本文第二部分的整个分析——那一段旧范式在支架加密后反常强化、持续高产的时期。它把那个迟滞的十年归因为某种不证自明的“思想滞后”，却没有追问：为什么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一整代训练有素的学者，持续站在已经变厚的地板上，却用旧概念命名新现象？

这里需要正面切割一个更深层的挑战。持这种解释的学者可能会辩称：支架加密后，学术共同体确实需要时间来消化新现实——这是“制度惯性”在起作用。“制度惯性”的解释力度在于，它指认了知识生产中真实的摩擦：期刊审稿周期、博士生训练周期、学术会议议题的设定惯习。本文不否认这些制度惯性的存在。但“制度惯性”所能解释的，只是“产出慢了”——新概念从提出到被接受需要一个代际的时间，这解释了为什么伦理转向直到2000年代才成为显学。

但它解释不了另一些东西。它解释不了为什么旧范式在同一时期不仅没有“慢下来”，反而进入了罕见的高产期——大量关于新现象的旧描述集中涌现，材料丰富、分析精细、逻辑自治。如果制度惯性只是让学术共同体“来不及更新概念”，你应该看到的是产出的衰减或平庸化——“找不到合适的词，先少写两篇”。但你看到的恰好相反：共同体在大量生产，只是生产出来的每一篇都在精确地把新东西往旧概念里装。这不能用“制度惯性”来解释。这需要一个新的解释项：概念工具本身的结构选择性能力，使得它在面对新现象时，不是“束手无策”，而是“极其高效地把它切成两半”——切下来的那一半被高质量地编织进分析正文，切不掉的那一半被体面地安置在脚注里。前者——制度惯性——指向的是时间性延迟（方向正确，速度缓慢）；后者——选择性捕获——指向的是方向性错配（速度很快，方向偏了）。这两者在动力学上截然不同。

本文的推进正在于此：不是用逆循环替代物质条件优先的解释——后者在它的问题域内依然成立，它正确回答了“伦理实践何以变得可见”——而是在后者的终止处，接上逆循环的分析，去解释为什么当对象已经变得可见之后，观察者仍然用了十多年才给它们一个不掉渣的名字。支架加密解释了田野里为什么有了可被看见的东西；逆循环解释了为什么看见它们的人，把看见的东西精确地命名成了别的东西，并且这种“精确的命名”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维持了十多年的自治。这两套分析是互补的，不是互斥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更完整的理论：一个范式转型的完整图景，需要同时包括“新对象的发生条件”和“旧描述的生成偏差”。

3.2 与库恩范式理论的正面切割

但上述推进仍然不足以确立本文的理论独立性。一个更深的挑战来自库恩（Kuhn, 1962）。在逆循环的三阶段结构与库恩的“常规科学-反常-危机-革命”之间，读者可能看到的不是分离，而是换名。本文有必要在此正面论证：逆循环分析在库恩范式理论的基础上，提供了三个后者无法给出的理论增量。

第一，命名遮蔽 vs. 实验反例。库恩的“反常”概念，核心是旧范式无法解释的实验结果。当科学家按照范式的预期去做实验，得到的结果与预期不一致，这就构成了反常。反常累积，引发危机，最终导致范式革命。库恩的整个叙事，依赖于“预期-反例”的认知结构：范式给了你一个预期，世界回给你一个反例，你被迫修改范式。

但本文的伦理转向案例，展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机制。涂尔干框架在面对支架加密后的新现象时，并没有产生库恩意义上的“反例”。它没有被田野事实驳倒——它精确地描述了那些事实中符合其预设的那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解释不了”，而在于“解释得太好了”——好到把那些新现象中超出自旧预设的那一面，精确地命名成了别的东西。这是“命名遮蔽”，不是“实验反例”。命名遮蔽的运作方式是：概念工具的结构选择性能力，预置了哪些现象面可以被看见、哪些会被当作附带现象滤掉。它在运行中不产生“错误”——它产生的是“合格的忽略”。它不是在实验台上被驳倒的，它是在田野笔记的脚注里被一笔笔延期的债务缓慢撑破的。

第二，支架溯源 vs. 范式内在动力。库恩的范式动力学，主要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展开的。范式被接受、被应用、在遭遇反常时被修补或放弃——这些过程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共同体内部的认知规范和评价标准。库恩偶尔会提到外部因素（如资助机制、仪器发展），但系统的“外部支架溯源”不是他的分析重心。逆循环分析恰恰在这点上做了一个库恩没有做的事：它将概念工具的认知特性，溯源至它被塑形时所依赖的特定制度支架。涂尔干框架之所以会在“规则执行”上锋利、在“自我构形”上钝，不是因为它内部有什么逻辑错误，而是因为它被塑形时的支架——稀薄的亲属制社会——将“规则执行”稳定地推到观察的焦点。这一笔溯源的意义在于，它为“钝感”提供了一个可被独立勘察的来源。

第三，体面递延 vs. 危机爆发。库恩的“危机”是一个相对戏剧性的阶段：反常累积到某个点，旧范式不再能有效运转，共同体陷入“显著的职业不安全感”，然后少数人开始尝试替代方案。但伦理转向的案例提示了一种更隐蔽的清算方式。涂尔干框架从未陷入库恩意义上的“危机”。没有某篇田野报告突然发现了一个它无法解释的“反例”，然后整个共同体陷入了不安。相反，它在整个1990年代运行得极其平稳，产出质量持续走高。解释债务的累积，是完全静默的——它被“合格的忽略”一层层递延到下一代学者手上。清算的时刻来临时，标志不是“旧范式被驳倒”，而是“旧范式被搁置”——新一代学者不再去修补它，而是回头去重新审视那些脚注中的材料，并给它们起了一个新名字。库恩没有分析过这种“静默清算”。

以上三点构成一个整体：逆循环分析不是库恩理论的换名。它提供了一个库恩没有提供的专门视角——从概念工具的命名功能出发，追溯其支架塑形，分析其钝感运行，追踪其静默债务的累积与清偿。

3.3 与更近的邻近者：皮克林与科林斯

与库恩的切割之后，还必须处理两个与本文更近的邻近者。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触及了与逆循环表面上相似的机制，如果不加区分，逆循环可能被误认为是它们的换名。

皮克林（Pickering, 1995）的“实践撞挤”（mangle of practice）描述了科学实践中物质条件与概念工具之间的相互“调校”。在这个图景中，科学家不断地在模型、仪器、实验结果之间来回调整，直到三者达到一个临时的稳定——然后这个稳定又被新的抵抗打破，进入下一轮撞挤。这个图景在动力学上与逆循环的A₂阶段有深层亲和：两者都描述了工具与材料之间持续的互相塑造。

但差异同样根本。皮克林的撞挤发生在每一次科学实践中——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弥散的调校过程，每一次实验都在同时修改物质程序与概念工具。撞挤的图景预设了工具与材料之间的双向可塑性：仪器可以被重组，概念也可以被修正。而逆循环描述的是一种特定的不对称：在A₂阶段，概念工具的那一端呈现出高度稳定——它没有被新现象“撞挤”出任何根本性的修正，反而以高精度的旧编码持续吸纳新现象。这不是皮克林意义上的“调校”，这是旧工具在单方面地对新材料进行高精度筛选。撞挤的前提是双方都在动；逆循环看见的恰恰是：一方在剧烈地动（田野地），另一方则通过自己极强的自治性，把每一次可能触发“相互调校”的信号都转化成了“可以在现有编码体系内被吸收的正常材料”。皮克林解释了“工具如何改变”，逆循环解释了“工具何以在应该改变的时候，极其高效地不改变”。

科林斯（Collins, 1985）的“实验者回归”（experimenter's regress）提供了另一个邻近机制。在科学争论中，争议双方对同一实验结果的解释往往互相对立，而评判谁的解释正确本身又依赖于那个有争议的实验——这就是回归。在科林斯的分析中，旧范式的维护者用辅助假说将反常的实验结果重新吸收进范式——这一操作与本文描述的“合格的忽略”在表面上相似：都涉及对反例的“吸收”。

切割点在于动作的层级。科林斯的实验者回归，核心发生在社会过程的争论空间——它是一个关于“谁的实验算数”、“谁能操作出标准结果”的对称性争论。旧范式维护者所做的“吸收”，是在一个公开的、有对立方的争议中执行的，吸收动作本身是被对方指认、被第三方评估的。而本文描述的“命名遮蔽”与“合格的忽略”，发生在认知过程的编码空间——它是一个关于“这个东西该被叫什么名

字”的前争论动作。在伦理转向的案例中，那个在脚注里被安置的“附带现象”，根本没有进入争论——它没有作为“对涂尔干框架的反驳”被提出，因为涂尔干框架给了它一个非常合理的名字（“修辞策略”），使得它不具有反驳的形态。实验者回归预设了反常已经被识别为反常（哪怕对它的解释有争议）；命名遮蔽恰恰决定了哪些东西不被识别为反常。这个区分的理论后果是：科林斯可以解释“争议如何被延长”，但无法解释“争议何以从未发生”——而后者，正是逆循环A₂阶段最核心的特征。

四、逆循环倒转：中国人类学最该勘察的地方

现在可以将这个分析框架倒转至中国人类学的当代处境。

西方伦理转向被引入中国的二十年间，主流的问题意识一直是“如何把伦理维度纳入我们的分析”。这个问法已经预设了答案的方向——我们需要一套更先进的理论工具，去捕捉田野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伦理实践。引介者梳理亚里士多德传统、福柯传统、现象学传统，整合成分析框架，然后期待在中国的田野地里看到类似的现象。

逆循环框架一旦就位，问题的方向就被翻转了。重要的不再是问“我们缺什么新工具”，而是问“我们现在最熟练的那套旧工具，在哪些地方正以最高精度持续错过田野里已经发生的事”。新工具的创生从来不对理论的梳理，它来自旧工具的解释债务积到撑破的那一天。

这不是抽象的宣言。它的操作形态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钝感预诊”来展示。预诊的目的不是指控某一部民族志“错了”——逆循环从不诊断个别学者的认知缺陷——而是展示：如果按照逆循环分析的勘察步骤，我们会对哪些文本特征警觉。

选取阎云翔（Yan, 2009）《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的一段分析作为预诊对象。这部作品在中国人类学界被广泛引用，其分析框架高度自治，对田野材料的处理堪称典范。阎著的核心分析框架——个体化命题——源自贝克（Beck）和吉登斯（Giddens）的个体化理论，但在本土化运用中，它与涂尔干式道德社会学形成了一个未曾言明却深度咬合的嵌套结构：个体化的中国农村青年被放置在一个“规范松动了”的框架里来理解，他们的行动因此被系统地编码为“对传统规范的逃离”、“对个人权利的诉求”或“对新型亲密关系的策略性建构”。这个编码体系在它的问题域内是极其高效的。

在分析一位农村妇女争取婚姻自主权的案例时，阎著呈现了丰富的口述材料。书中描述了一位名叫张兰的妇女顶着父母的强烈反对，坚持退掉包办婚约，与她自己选择的伴侣结婚。阎著的正文分析将这些行动精确地编码为“个体化进程中的权利觉醒”和“对抗传统父权规范的能动性实践”。这一编码精准捕获了张兰行动中反抗规范的那一面，将其锚定在个体化理论的问题域内，论证坚实。

但在张兰的口述转录中，她说了一些溢出上述编码的话。她这样描述自己当年做出决定时的心情：“我知道我爸妈是为我好。那个男的家确实有钱，人也老实。我不是说他不好。但我就是觉得，如果我就这么嫁了，我这辈子就没做过我自己。”随后她又补充了一句，书中以直接引语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后来我嫁了我自己选的，日子也苦。但我认。这是我自己的路，再苦我认。”

这段话透露出一种与“权利觉醒”在性质上不同的东西。张兰的挣扎，不是“我的权利被父权规范剥夺了”——那是在一个规范框架内要求重新分配权利。她的挣扎是“我如何在两套都讲得通的规范之间，为我自己找到一个能让自己认命的伦理位置”。她接受父母那一套规范框架的合法性（“我爸妈是为我好”）；她也接受她自己这套选择的苦果（“再苦我认”）。她做的事，不是在规范之间做策略选择，而是把自己构成一个能够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伦理责任的人。

阎著没有忽略这句话。相反，它被作为“主体性叙事”的一个例证被引证，用以说明个体化的深入——个体不仅在行为上自主，还在话语层面为自己的自主提供正当性论证。这个分类在个体化范式内是完全有效的。但一个逆循环分析的使用者会在此处停住，追问：这句话承载的东西，是否有一部分溢出了“为自己提供正当性论证”这个功能编码？“我认”——这不是“我论证”，这是“我承担”。一个人论证自己的选择时，她是在向别人说话；一个人说“我认”时，她是在向自己说话。前者指向的是规范的层面——如何让他人接受我的选择；后者指向的是伦理的层面——如何让自己承受自己的选择。当阎著的框架将这句话归类为“正当性话语”时，它实际上把它向别人说话的那一面精确地捕获了，但把它向自己说话的那一面漏掉了。这不是作者的失误，这是编码体系的结构性的选择能力：个体化框架被设计出来，就是要去捕捉“个体如何从传统规范中脱嵌”，而不是去捕捉“个体在脱嵌后如何在伦理上重新安放自己”。张兰说“我认”——这是后一个故事的开头。

这个预诊的目的到此为止。它不是在宣称阎著“应该”用伦理维度去分析张兰。它只是在展示：如果我们按照逆循环分析的步骤去勘察一部民族志文本——找它的核心编码词（“权利觉醒”、“能动性”、“正当性论证”），辨认这套编码体系的结构性的预设（个体从规范中脱嵌），然后在文本中寻找那些被编码词准确覆盖但仍溢出编码范围的残余材料（“我认”）——我们会发现什么。预诊所发现的，不是这部民族志的“错误”，而是它的编码体系与它所面对的田野材料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缝隙。这个缝隙在单个文本中可能只是一句话。但如果这个编码体系在中国人类学中被广泛使用，那么在数十部民族志的文本中，这个缝隙就可能以脚注、引语、边缘絮语的形式，累积出一笔可观的解释债务。

中国人类学如果有一个急迫的理论任务，它可能不是“创生出中国版伦理转向的新概念”，也不是急着去找到一个正在发生的伦理实

践的新地层。它最先要做的，是诚实地描绘出中国田野地当下那套最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范式，在哪些地方正以最高精度持续钝感。这件事的紧迫性在于：逆循环的A₂阶段是一个极其舒适的地带——高产、自治、学术共同体内部高度默契。你在这个阶段走出的每一步，都积下了一笔在审稿人那里获得表扬、在同行那里获得点头的债。债是甜的，直到清偿的那天。

而逆循环分析可以提供的唯一一次预警是：不要等问题来找你。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就躺在那篇你觉得写得最好的文章的脚步注里。

五、剥离：逆循环作为一种可复现的分析思路

5.1 从人类学到更远处

逆循环不是一个专属于人类学的现象。前文的案例说明了一种特定结构的生成偏差：一套被特定制度支架塑形的概念工具，在支架变动后反常强化并对新信号展现出系统性钝感，最终以解释债务清算的形式催生范式革命。这一节的任务，是将这个机制从人类学这一个案中剥离，剥到它最骨干的结构，然后在另一个学科重建它——不是用人类学的案例去“套”别的领域，而是用完全独立的学科材料，去展示同一种骨架在完全不同的肌理里的复现。

逆循环的三个阶段可以剥成纯粹的形式结构：

A₁. 工具塑形期：一组概念工具或认知范式，被特定的外部支架（材料条件、组织形态、制度安排）同步塑形。工具与支架构成高匹配的闭合回路——支架将某些现象稳定推到观察焦点，工具被调校到专精于捕捉这些现象。

A₂. 反常强化期：外部支架发生实质性变动，但工具的内在使用者共同体维持着高强度、自治的再生产循环。旧工具在面对支架变动泄露的新信号时，展现出系统性的钝感——它持续产出关于新现象的旧描述。这一阶段的高产与自治，将“漏掉的部分”遮蔽得比支架稳定期更深。

A₃. 清偿期：钝感累积的解释债务在跨代际更替、跨领域移植或某个外部震荡中被集中清算。清算的标志不是旧工具被驳倒，而是它被搁置——新一代研究者不再修补它，而是回头去命名那批被它系统漏掉的现象。新范式不是“向前看”的结果，而是对钝感期旧债的一次回溯性追认。

这是一个形式骨架。它不携带任何人类学的具体内容。下面在科学史中重建一次，不是作为旁证，而是作为独立复现。

5.2 复现：科学史中的逆循环

二十世纪中期，科学哲学的主流是逻辑实证主义。它的核心关切是：如何把科学理论还原为纯粹的观察陈述与逻辑推导。这是一套对“科学知识何以是可靠的”的极其强大的解释工具。

但这套工具在一个特定现象面前展现出了持续的系统性钝感——理论更替。当科学家从牛顿力学转向相对论、从燃素说转向氧气说时，这个过程完全不符合逻辑实证主义所描述的“新证据→修正理论→逼近真理”的平滑累积模型。一个信奉牛顿力学的科学家共同体，在面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反常结果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抛弃旧范式，而是在旧范式内部寻找辅助假说来吸收反常。逻辑实证主义持续将这种“范式内部的修补”描述为科学理性运作的正常过程——它把“抵抗新范式的固执”命名为“对辅助假说的审慎检验”，从而将钝感本身重新吸收进了自己的合理性标准里。

这就是A₂阶段的典型形态。逻辑实证主义在面对理论更替现象时，没有当场失效——它反而用极高的精度产出了大量关于“科学家如何审慎对待反例”的描述。这些描述在它自己的共同体内部完全自治。但它在持续漏掉一件事：当审慎积累到某个临界点时，科学共同体会发生一次无法用“渐进累积”来描述的世界观更替。那个更替的瞬间、那个断裂的结构，被逻辑实证主义系统性地忽略——当作“发现的语境”或“非理性因素”归类到不值得被单独理论化的次级位置里，与科学哲学的合理内核隔离开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Kuhn, 1962）正是这笔解释债务的清算。库恩不是“向前看”发现了范式革命的——革命在科学史上一直在发生。他是在“向后看”，把那批被逻辑实证主义长期归类为“非理性因素”而悬置不理的现象，重新命名为“常规科学”与“范式革命”的断裂结构。

再看一个更具体的科学史案例：魏格纳（Wegener, 1915）的大陆漂移说。魏格纳在1912年提出大陆漂移假说时，他的经验证据类型——海岸线吻合、古生物化石的跨大洋分布、古气候带的位移——对于当时主流地质学的固定论范式而言，分别可以被归类为不同的“非构造性解释”：海岸线吻合是巧合，化石分布可以用已沉没的陆桥解释，古气候位移是地球自转轴变动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能独立驳倒固定论范式。旧范式在长达半个世纪里的应对，正是典型的A₂阶段——它用一个高度自治的修补体系，将漂移说的每一项证据都重新吸收进了固定论框架内。在1950年代，固定论者在回应漂移说的挑战时，持续使用了一套高度自治的解释策略：任何指向“大陆曾相连”的古生物证据，都被重新编码为“已沉没陆桥的存在证据”；任何指向“大陆位移”的地质现象，都被重新解释为“地壳垂直运动的局部表现”。这一时期的固定论地质学并非在衰退——恰恰相反，它在修补这些“反常”的过程中，产出了大量精细的地层学、古生物地理学成果。这些成果在学术质量上——数据丰富性、分析精细度——完全不逊于后来的板块构造学说。它们对漂移说的每一条“反例”都给出

了一个当时完全合理的解释，并将所有无法解释的残余安放在“未来研究待定”的边缘位置。旧范式没有瞎。旧范式是把同一批现象，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在每个关键节点上给出一个当时足够体面的替代解释，从而把清算日期一推再推。直到1960年代，古地磁数据提供了一个无法被“陆桥”或“轴移”重新吸收的证据类型——大洋中脊两侧对称的磁异常条带不依赖任何古生物或古气候推断，它直接测量了洋底在过去地质时期中的扩张轨迹。这笔欠了五十年的解释债务，在这个意外的技术旁路上被意外清算。板块构造学说诞生后回头看，那些被旧范式用“陆桥”、“巧合”、“轴移”等概念精确命名了半个世纪的古生物和地质现象，从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指认同一件事——大陆确实在漂移。新范式不是“向前看”发现了新证据，而是“向后看”，给那批被旧范式持续重述了五十年的“旧证据”补上了一个它们一直在指认、却一直被叫错的名字。

逆循环的形式骨架在这里完全复现，不依赖任何人类学的具体内容。

5.3 使用说明：逆循环在组织研究中的生长潜能

现在将这组分析工具长到另一个土壤里。以下不是用组织研究的材料去套逆循环的格式；而是用组织研究自身的历史材料，去辨识其中是否存在一套与伦理转向案例结构同形但材料完全独立的生成偏差。如果辨识不出来，那是逆循环的钝感边界到了。

在组织研究中，组织印记理论是一个极佳的“受检对象”。其原初塑形（A₁阶段）依赖的制度支架是二十世纪中叶相对稳定的产业环境。Stinchcombe（1965）的经典论证被这个支架塑形后，具有了高度的精确性：在环境变动缓慢的产业里，组织成立初期被环境打下的烙印——创始人的价值观、初始的资源结构、行业的基本竞争规则——会主导组织终身的结构与行为。这套概念工具与它的原初支架高度匹配。

但自1980年代以来，组织环境的支架发生了实质性变动。技术迭代加速、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全球化使行业边界模糊——这些变动创造了大量“组织在成立后主动修改自身初期印记”的实例。面对这个变动，组织印记理论进入了典型的A₂阶段：它没有当场失效，反而在“印记可变性”、“印记衰减”、“多重印记叠加”、“印记修复”等精细化方向上进入高产期。这些精细化工作在学术质量上是极高的——大量优质论文在顶级期刊发表，彼此引用，形成一个高度自治的研究纲领。

在这个精细化进程中，组织生态学中的“结构性惰性”概念（Hannan & Freeman, 1984）是一个尤其需要切割的邻近者。结构性惰性指的是组织在成立后其核心结构特征趋于不变——因为变化的尝试可能降低组织的可靠性与可问责性，从而降低其生存概率。这个机制在表面上与逆循环的A₂阶段相似：都在描述一个系统“为什么不改变”。

但切割点是清晰的。结构性惰性解释的“不变”，是组织层面的——它说的是组织在面对环境变化时，其正式结构、核心流程不改变。这个不改变的原因，是改变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逆循环解释的“不改变”，是认知-制度层面的——它说的是一套描述组织的概念工具，在面对环境变化时，其核心编码体系不改变。这个不改变的原因，不是改变的成本太高，而是这套工具在A₂阶段运行得太好了——它用高精度的旧编码持续吸纳新现象，以至于使用者不觉得有改变的必要。结构性惰性是“想变但变不动”；反常强化是“运转得太顺了，没人觉得该变”。这两个机制在经验上可以同时发生，但它们在动力学上是独立的——前者是一个组织的生存约束问题，后者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认知自治问题。

回到逆循环分析的核心问题：这套精细化进程中正在静默累积的解释债务，可能在哪里？当组织主动修改自身印记时——比如，一家传统制造企业试图“转型”为科技公司，它所做的不仅是调整资源分配和组织结构，它还在对组织成员的集体身份做出一个伦理判断：

“我们过去做的那种事，不再是我们认为值得做的事了。”这个判断对老员工而言是一笔深刻的伦理亏空，需要用大量的叙事修补、意义重建、甚至是集体哀悼来消化。但印记理论在它的精细化进程中，一直将“身份”作为一个影响印记衰减速度的调节变量来处理——它精确地测量了“身份认同强”的组织印记衰减更慢，但从未正式命名那个修改动作本身对成员伦理身份的改造。这不是理论的错误，这是理论的钝感。它把“伦理构形”这个维度，持续地、精确地描述为“身份调节效应”。研究者不觉得漏了什么，因为用“身份”去解释，自洽性完好。但如果有朝一日，组织研究的理论焦点从“组织的绩效”转向“组织内人的伦理生存”，那么印记理论这十几年的精细化，欠下的那笔关于“伦理构形”的债，就可能在某个跨代际的学术更替中被集中清算——未来某个学者会回头，重读这十几年间的印记文献，然后问：“他们为什么从来没有正式命名过那件事？”逆循环不预测那一天何时到来。它只轻推一下研究者：如果你此刻去读五篇被你引用最多的印记论文，也许你能在某个“本研究未处理”的声明里，找到那笔债的第一张借据。

六、结语：先认钝，才可能锋利

现在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给出一个完整的回答。

西方人类学的伦理转向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标准的答案是“理论先于田野”。修正的答案是“田野先于理论”。本文给出的答案是：两者都不对。真正发生的，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反向过程——理论生产的逆循环。一套被稀薄制度支架塑形的旧概念工具（涂尔干式的“道德”），在田野支架加密后没有当场失灵，而是进入了反常强化期：它持续高产、高度自治、精确得令人满意，却系统性地对那些后来被叫做“伦理实践”的动作命名成了别的东西。不是人类学家没有看见田野里在发生什么，而是他们用来命名的工具精准地漏掉了这些

东西中最重要的那一面——不是当作错误拒绝了，是当作“附带现象”体面地安置在脚注里，然后递延到下一年、下一个十年。直到这笔解释债务在跨代际学术更替中被清算，新一代学者才回头，给那些被旧工具系统漏掉的现象补上了一个迟到的名字——“日常伦理实践”。伦理转向不是向前看的结果，它是向后看、认出一笔旧债后的清偿。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对当下中国人类学的启示就发生了一次根本的翻转。我们需要的不是迫新——不是急着引介最新潮的伦理理论去“纳入分析”。我们最先需要的是认钝。是诚实地识别：我们现在最熟练、最自治、最能产出精确判断的那套理论工具，在哪些地方正以最高精度持续错过田野里已经发生的事。它最自治的地方，就是它钝感最深的地方。它最高产的地方，就是它在静默欠债的地方。

而这正是逆循环分析可以提供的唯一一次预警：如果你已经在你最锋利的工具上，连续数年只感觉到锋利，如果你读自己的旧作时所有的判断都还能站立，如果你在田野里撞见的所有“意外”都能被你的概念系统舒服地消化成“有意思的但不符合纳入标准的个案”——那么，工具已经不是你的手在用它。你在它的钝处里住着。你还没有欠下足以撑破它的那笔债，而你最需要做的，或许不是赶快去找新东西来填，而是先停下来，认一认：它今年帮你漏掉了什么。

这篇论文的最后动作，是直视自身。逆循环分析，作为一套概念工具，同样是在特定制度支架下被塑形的。它被本文塑形时所依赖的支架，是人类学“伦理转向”这一个案。它在这一支架上被调校出高度的分析精确性。这意味着，在另一个领域使用时，它也会有自己的盲区。它可能会在那些旧范式不是通过“命名遮蔽”而是通过其他机制维持自身的案例中失效。它可能在那些支架变动不是加密而是根本性重构的案例中力不从心。它可能无法充分解释那些旧范式在A₂阶段不是“高精度遮蔽”而是“粗糙的压制”的案例。这些局限不是理论本身的缺陷，而是任何一个从个案中剥离出的分析框架与生俱来的边界。本文所做的，不是宣称逆循环是唯一的范式转型机制，而是把它从这一个案中剥离出来，交给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去试用、去验证、去修改、去证伪——或去发现它的钝感。

最后，作为这篇论文的作者，我必须给出这个核心论点的明确证伪条件。本文的核心主张是：在伦理转向的案例中，旧范式（涂尔干框架）在支架加密后经历了一段反常强化期，其系统钝感所累积的解释债务，构成了范式转换的必要机制。这意味着，如果没有A₂阶段（反常强化与钝感累积）的中间机制，仅凭A₁（支架加密→伦理实践增多）加上某种不特定的“思想滞后”，不足以充分解释A₃（新范式诞生）的时刻与性质。

如果本文提出的机制是错的，那么在以下条件被满足时它应被放弃——并且在被迫放弃时，它不会假借任何“反例其实恰好证明了理论”的修辞来保护自己：在比较科学史、组织研究或政策变迁的五个以上独立案例中，应能观察到支架变动后，旧范式在现场进入的不是“反常强化与钝感累积期”，而是快速且平滑的自我修正——即共同体在支架变动后一个代际内就完成了对核心概念工具的根本修正，且修正后的新概念精准覆盖了支架变动释出的信号，中间不存在一段可被独立编码的、旧范式在学术产出中质量持续走高却在特定维度上系统遗漏的时期。如果这些案例确实如此，那么本文所提出的逆循环机制将不具备优于简单“认知滞后”模型的理论增量。另一个同样需要接受证伪检验的错误预测是：如果在伦理转向之前十年间的人类学道德研究民族志中，经系统的文本分析未能发现本文所描绘的那种“正文精确覆盖某维度而脚注或边缘材料系统性地搁置另一维度”的文本症候——也就是说，那些脚注里并没有堆积大量后来被译为伦理实践的材料的原生痕迹——那么本文关于A₂阶段运行方式的经验描述就是错的。

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被确证，本文的核心论证将不再能站立。本文接受这个风险。因为一套不能被杀死的东西，就从来不曾真正活过。

参考文献

- Aristotle. (c. 350 B.C.E.). *Nicomachean Ethics*.
- Collins, H. M. (1985). *Changing Order: Replication and Induc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 London: Sage.
- Durkheim, E. (1893).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étude sur l'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 supérieures*. Paris: Alcan.
- Durkheim, E. (1912).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le système totémique en Australie*. Paris: Alcan.
- Foucault, M. (1984).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vol. 2: *L'usage des plaisirs*; vol. 3: *Le souci de soi*. Paris: Gallimard.
- Foucault, M.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L. H. Martin, H. Gutman, & P. H. Hutton (Eds.),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Hann, C. M. (1992). Market principle, market-place and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R. Dilley (Ed.), *Contesting Markets: Analyses of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racti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Hannan, M. T., & Freeman, J. (1984). Structural inertia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2), 149–164.
-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idlaw, J. (2002). For an anthropology of ethics and freedom.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2), 311–332.
- Lambek, M. (Ed.). (2010). *Ordinary ethics: Anthropology, language, and acti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Pickering, A. (1995).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bbins, J. (2013). 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3), 447–462.
- Stinchcombe, A. L.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 J. G.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 McNally.
- Wegener, A. (1915). *Die Entstehung der Kontinente und Ozeane*. Braunschweig: Friedrich Vieweg & Sohn.
- Yan, Y. (2009).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Oxford: Berg.
- Zigon, J. (2007). Moral and ethical assemblages: A proposal for a new anthropology of moralit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7(2), 239–268.